

明清综合性日用类书变迁考*

蘇航** · 崔桓***

【目 录】

- | | |
|----------------|----------------|
| 1. 引言 | 5) 出版者及出版地 |
| 2. 明清日用类书的版本发展 | 3. 明清日用类书的内容变迁 |
| 1) 日用类书的出版历程 | 1) 类目变化 |
| 2) 书名变化 | 2) 具体内容的变化 |
| 3) 内容量变化 | 4. 结语 |
| 4) 编辑排印的变化 | |

【摘要】

明万历后出现的新型综合性日用类书由于其贴近民间、贴近生活之特性,刊刻热潮持续两三百年之久,并为我们保存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如今此类书籍散落海内外各地,搜求尤为不便,故学界至今缺乏对其源流变迁全貌进行考察的研究成果,对研究者使用该文献造成了一定困难。本文通过对明清日用类书的版本进行系统梳理,考察其在各个时间段不同的发展特点及内容变化,揭示出自晚明后,日用类书由最初的百花齐放,逐渐统一定型。为控制成本,增加销量,该类书籍内容量呈逐渐减少态势。内容上,日用类书一直根据时代的变迁及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书中具体内容,并在清乾隆、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进行了三次较大的内容修订。

【关键词】明清综合性日用类书; 日用类书; 万宝全书; 版本发展; 内容变迁。

* 이 연구는 2021년도 영남대학교 학술연구조성비에 의한 것임.

** 第一作者. 韩国岭南大学中国言语文化学科博士生 (cdsuhang@qq.com)。

*** 通讯作者. 韩国岭南大学中国言语文化学科教授 (hchoi@ynu.ac.kr)。

1. 引言

“日用类书”这一术语，最早为日本学者发明，影响所及，中文学界亦沿袭使用。对于日用类书这一民间文献形式，学界目前倾向于将其划分为综合性日用类书、专科性日用类书（如童蒙教养、书翰启札、经商贸易、故事类等）和村落日用类书三类。早期的综合性日用类书起源于南宋，以《事林广记》为代表，但此时期的综合性日用类书还含有专供上层社会参阅的内容，诸如宫室、辞章、仪礼、仙境等，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类书”，正如台湾学者吴蕙芳所指出的那样，此类书籍的诉求对象并不是四民大众，因《事林广记》无论就书名、书旨均未标识是为四民大众所作，与后来明确定位书籍诉求对象为四民大众的“万宝全书”系列民间日用类书并不相同。¹⁾元以及明早期刊行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居家必备》等亦属此类。直至明万历年间，一种在早期日用类书基础上加以增删修改、重新编订的新型日用类书开始出现。这些类书更加贴近民间，将许多专供上层社会参阅的内容尽数删去，又加入一些民间常用的知识，并开始全面采用上下分层式的编排方式，此一方面可以节省空间，减少成本，从而吸引更多读者购买，另一方面，也使纷杂的内容得以以更加清晰、美观的方式展现。此种日用类书一经出现，即大为盛行，其刊刻热潮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本文所称日用类书，即指此种明万历后出现的新型综合性日用类书。（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为“日用类书”）

随着社会生活史、民俗史以及商业史研究的升温，中国学界开始越来越注重民间新史料的发掘工作，尤其是与民间社会、庶民大众直接相关的新史料。日用类书由于其贴近民间、贴近生活之特性，为我们保存了当时民间社会生活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不可多得的珍贵研究素材，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各类相关学科的研究中。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研究成果大多只是利用日用类书作为其研究的参考或佐证资料，且大多局限于明代，对于清代日用类书鲜有论及。将日用类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发展历史、对其版本进行梳理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这主要是由于此种书籍版本众多，纷繁复杂，又大多流失海外，现实上考察难度较大所致。但实际上，由于日用类书自晚明至民国一直不断被刊刻，时间跨度长达三百余年，其刊刻内容也一直随着现实需要在做调整，时代不同，日用类书的版本差异也较大，而今学者多随意混用书中材料，而不论其版本、考其变迁，此有失严谨，严重影响研究的准确度，不可不察。

因此，本文拟对明清日用类书的版本进行系统梳理，考察其在各个时间段不同的发展

1) 吴蕙芳，《明清以来民间生活知识的建构与传递》，台湾学生书局，2007，p. 2。

特点及内容变化，以期进一步加深对日用类书性质、渊源及流变的了解，并为研究人员提供利用上的便利。

2. 明清日用类书的版本发展

1) 日用类书的出版历程

台湾学者吴蕙芳曾编有明清各版的日用类书目录²⁾，但由于时代所限，脱落较多，本文该目录基础上，综合比对各大古籍目录数据库及私人收藏信息，新补增33种日用类书，共计109种，其中明版44种，清版61种，现根据出版系统（以编者为主要划分依据）及刊行年代，分别列表如下（〈表1〉、〈表2〉）³⁾。

从表中可看出，自明万历年间新式综合性日用类书出现之后⁴⁾，此种书籍一直刊行不缀，成为民间日用的重要参考资料，其风行程度，可从下段广告性质的文字中窥见一二：

“三刻新版。兹书本堂原有编刻，已经大行。近因二刻板朦，不便命工绣梓，乃恳双松刘君删旧补新，摘粹拔尤，海内识者，靡不称羨。迩来嗜利棍徒，假票混育，翻刻不备，不惟观者无益，且令用者有误，于是三刻真本，中刻名‘真万宝全书’，票用双松印记，买者查有姓号，方不误认。谨白。 书林安正堂刘双松重梓。”（《全补文林妙锦万宝全书》扉页题识）

〈表1〉 明清综合性日用类书系统统计表

| 版本系统 | 出版总数 | 出版起止年限 | 明版种数 | 清版种数 | 朝代不详 |
|------|------|-----------|------|------|------|
| 不详 | 10 | 1596-1912 | 5 | 4 | 1 |
| 郑世魁 | 1 | 1597 | 1 | 0 | 0 |
| 书林詹氏 | 1 | 1598 | 1 | 0 | 0 |
| 余象斗 | 1 | 1599 | 1 | 0 | 0 |
| 徐会瀛 | 3 | 1600 | 3 | 0 | 0 |
| 陈耀吾 | 1 | 1602 | 1 | 0 | 0 |
| 承明甫 | 1 | 1604 | 1 | 0 | 0 |
| 龙阳子 | 3 | 1607-1609 | 3 | 0 | 0 |
| 武纬子 | 1 | 1607 | 1 | 0 | 0 |

2) 吴蕙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p. 35。
3) 未有刊行的年号则省略，如泰昌、天启、顺治、雍正、宣统等；本表不包含刊年不详的版本。
4) 目前可见最早之新型综合性日用类书为万历24年（1596）刊《新镌天下备览文林类记万书萃宝》。

| | | | | | |
|---------|-----|----------------------|----|----|---|
| 徐企龙 | 3 | 1610-1614 | 3 | 0 | 0 |
| 江三汲 | 2 | 1611 | 2 | 0 | 0 |
| 刘双松 | 1 | 1612 | 1 | 0 | 0 |
| 饶顺卿 | 1 | 1613 | 1 | 0 | 0 |
| 朱鼎臣 | 3 | 1614 | 3 | 0 | 0 |
| 艾南英 | 4 | 1628 (崇祯) | 4 | 0 | 0 |
| 陈继儒 | 51 | 1628-民国 | 1 | 50 | 0 |
| 张溥 | 9 | 1636-1808 | 2 | 5 | 2 |
| 郑尚玄 | 1 | 1641 | 1 | 0 | 0 |
| 葆和子 | 1 | 万历 | 1 | 0 | 0 |
| 博览子 | 1 | 万历 | 1 | 0 | 0 |
| 陈允中 | 1 | 万历 | 1 | 0 | 0 |
| 周文焕、周文炜 | 1 | 万历 | 1 | 0 | 0 |
| 李光裕 | 2 | 崇祯 | 2 | 0 | 0 |
| 徐九一 | 1 | 明末 | 1 | 0 | 0 |
| 徐樵云 | 1 | 明 | 1 | 0 | 0 |
| 赵植吾 | 1 | 明 | 1 | 0 | 0 |
| 烟水山人 | 2 | 康熙-1746 | 0 | 2 | 0 |
| 许衡 | 1 | 元 (伪书) ⁵⁾ | 0 | 1 | 0 |
| 合计 | 109 | -- | 44 | 61 | 3 |

〈表2〉明清综合性日用类书系统统计表出刊年代统计表

| 年代 | 万历 | 崇祯 | 康熙 | 乾隆 | 嘉庆 | 道光 | 咸丰 | 同治 | 光绪 |
|------|----|----|----|----|----|----|----|----|----|
| 出版数量 | 26 | 11 | 1 | 21 | 7 | 9 | 2 | 2 | 11 |

该书在万历四十年时已经是第三次印刷了，“二刻板滕”很可能就是因为第二版多次重印所致，不仅如此，该书的盗版还很多，因此安正堂在第三次刊刻时增刻了版权标识。由此可见日用类书销量之大，受众之广。

但令人疑惑的是，日用类书在经历晚明的刊刻热潮后，清初却突然消沉，自崇祯至康熙长达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竟只有一种日用类书出版。此或与当时明清易代的历史背景有关。首先是兵祸的影响，1644年明朝灭亡。同年清军入关，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清军刚入关时，采取了野蛮的烧杀抢掠政策，全国各地兵灾不断，特别是南方出版业发达的地区，兵灾尤其严重，扬州十日，“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城中积尸如乱麻

5) 该书当为清末人编辑而成，详见苏航、崔桓，〈日用类书《万宝全书》的版本源流和系统研究〉，《东亚人文学》，第47辑，2019.06，pp. 289-315。

”⁶⁾。明末清初之印刷出版业及出版市场,也不可避免地在此兵灾中饱受打击,渐趋萎靡。其次,清廷采取的文化、出版高压政策也对日用类书的刊刻产生了不利影响,康雍乾三朝,清廷共发动了大大小小120多次文字狱,在一些案件中,如“庄廷鑑明史稿案”,不特作者惨遭戮尸,满门凌迟,连与该书有关的刻工、刷匠、书商和藏书者,皆一一问斩。《学政全书·书坊禁例》中为我们保存了这样的题奏:“顺治九年题准: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益文业诸书,其他琐语淫词,及一切滥刻窗艺、社稿,通行严禁,违者从重究治。”⁷⁾而日用类书包罗万象,有许多内容正属于“琐语淫词”,在这样的风气之下,日用类书的刊刻受阻也是必然之事。此外,明代的一些日用类书甚至直接被纳入了禁书目录中,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⁸⁾中收录的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大学士管闽浙总督汇署福建巡抚三宝所奏的“为查缴应毁各书,恭折具奏事”中,附有“福建省续查出应毁各书开列清单”,其中就包括“《万宝全书》一部,刊本。是书明刘双松辑,内分天文等门,计三十九卷。语涉触碍,并有符咒邪妄处”,乾隆四十四年已是日用类书重新开始刊刻之时,尚且如此,可以想见清前期日用类书重新刊刻之难度。

迨至乾隆,随着前期清廷采取的一系列战后修复措施,农业逐渐恢复,社会经济开始复苏,出版业也进开始繁荣起来。日用类书也由此焕发了第2春,开始进入另一个刊刻高潮,仅乾隆一朝,就有20余种日用类书出刊,当然,此时期的日用类书内容上为了迎合清廷统治,较前时期已做过许多改变,具体修改情况将在本文第三章中详细论述。

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清代出现了一系列明版陈继儒编日用类书的删改之作,这一系统的日用类书往往会在书前加上署名“乾隆四年春王月·毛焕文增补识”的序,成为清代日用类书刊出版的绝对主流。自清乾隆四年(1739)后,该书被不断修改再版,终有清一代,共有50种不同版本(目前已知的清刊本日用类书仅61种,且自嘉庆后,几乎未见其他系统的日用类书),一直到民国,该系统一直被不断重新刊刻。

而后日用类书的刊刻一直绵延不缀,但内容、形态已基本定型,基本是乾隆时期出版的日用类书的再版而已。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科学技术及思想文化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的社会性质也一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生活发生了亘古未有的巨变,以民间日用宝书为标榜的日用类书也不得不增加相关内容以适应时代的变迁,因此在清末,日用类书迎来了一次内容与形态上的双重巨变。到了民国,日用类书的出版仍然十分流行,虽内容上已经开始迎合新建立的民国,但与前期类书有明显继承关系,故在后文中,笔者亦有选取一种民国刊陈继儒系统日用类书,作为明清日用类书发展的余声,纳入考察范畴。但需说明,本文对民国及之后的日用类书,不做深入讨论。⁹⁾

6) [明]归庄,《先兄监纪君行状》,见《归庄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 索尔讷,《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p.32。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 书名变化

晚明时期,日用类书的书名比较多样,未成定式,且普遍较长,如“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新刻眉公陈先生编辑诸书备采万卷搜奇全书”、“新板增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新刻剑溪堂订补全书备考”、“新刻四民便览万书萃锦”、“龙头一览学海不求人”、“新锲天下备览文林类记万书萃宝”、“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便观五车拔锦”、“新锲燕台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宝万卷星罗”、“新锲万轴楼选删补天下捷用诸书博览”等。细一考察,便可发现一些共通之处,首先,这些书名大多含有“万”、“全”等字眼,旨在标榜该类书籍无所不包的特性。其次,或许书商又大多希望从书名中展示书籍的使用性质,于是便加上一些“四民”、“便观”、“备览”、“不求人”等字眼;又,几乎所有书名都被冠以“新锲”“新刻”字样,以标明书籍内容之与时俱进,贴合当下。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这些书名都含有广告成分,系书商为招徕顾客之宣传手段。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此时期由于日用类书刚刚出现,民众对此类书籍还不太熟悉,书商需要通过这种简单明了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书籍性质,并最终达到推销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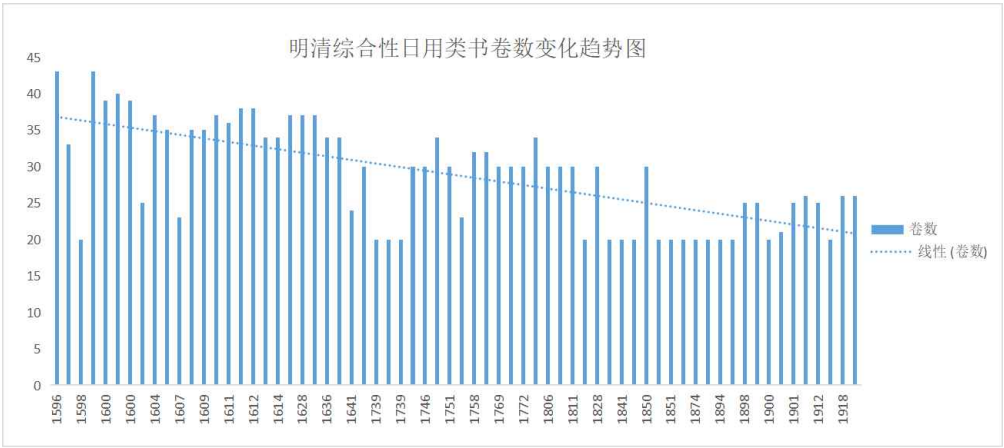
进入清代,日用类书的名称开始定型,皆以“万宝全书”为名,在目前可见的所有清刊本日用类书中,再未发现其他书名,“万宝全书”也成为了日用类书的代称。此外,清刊本日用类书的书名都较明代为短,普遍只在书名前加上“增补”、“绘图增补”的前缀,不再有各式各样的提示文字,十分简洁。这表明进入清代后,日用类书及“万宝全书”这一书名在读者中的辨识度已经很高,不需要书商再做过多宣传了。可以作为旁证的是,晚明早期刊刻的日用类书目录页前常附有推销性质的广告,以说明自身四民使用之性质,并标榜本书内容之丰富,如余文台编《类聚三台万用正宗》,扉页就有一段广告标识:“本堂近锲此书,名为万用正宗者,分门定类,据载全备,展卷阅之,诸用了然,更不待他求矣。”但这种广告标识随着日用类书的广泛刊刻开始逐渐缩减,至清代,除序外其他宣传性文字已几乎完全消失。由此可见,至迟至清代,日用类书的价值与性质已为读者所熟悉,其与民间生活也已产生了一定固定联系,书名自然亦可简化。

3) 内容量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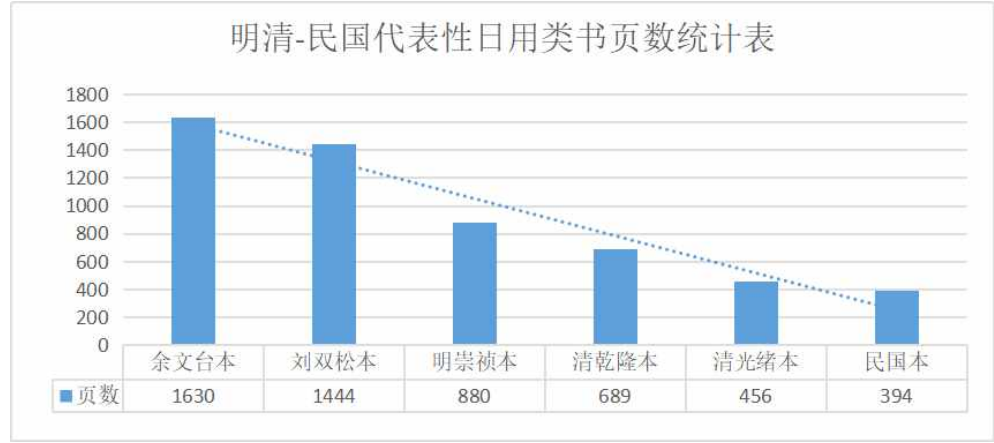
内容量变化首先体现在卷数上,本文选取明清两代能够准确确定出版年度(精确到

9) 关于民国刊日用类书状况,可参见崔桓,〈中国近现代类书的 종합적 연구〉,《东亚人文学》,第49辑,2019.12, pp.121-149。

年)及出版卷数的66种日用类书作为样本,制成明清日用类书卷数变化趋势图,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到,虽然卷数在特定时期有反复,但总体是在呈下降趋势。晚明时期由于日用类书系统较多,卷数变化也较大,从最多的43卷到最少的20卷不等,但绝大多数类书都在30卷以上,明显高于清版。而由于绝大多数清版日用类书都属于陈继儒系统,因此卷数差别不大。



清早期日用类书大多属于陈继儒系统的30卷本,清后期一般属于陈继儒系统的20卷本,也是呈下降趋势。到了清末,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出现了一种在20卷本基础上的续编之作,有续编5卷本和续编6卷本两种。



页数的下降趋势更加明显,本文对晚明至民国的6个代表性日用类书页码进行了统计¹⁰⁾,其结果如图所示,其中的清乾隆本为上述30卷本的代表,光绪本为上述20卷本的

代表。可以看到,日用类书页数从最高峰的1630页下降到了20卷本的456页¹¹⁾,下降幅度高达72%,大大超过卷数的下降幅度,可见卷内删减内容之多。另需说明的是,由于民国本已经采用石印方式印刷,不能以页数做简单的对比,其内容量实质上较20卷本为多。

综上,明清日用类书的内容量整体呈下降趋势,且下降幅度较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随着日用类书的大量使用,书商对于民众的使用偏好有了更深的理解,得以删除一些使用度不高的门类(类目变化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本文第三章第一节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减少内容量后可以降低成本,使书商得以以更低廉的价格招徕顾客。

4) 编辑排印的变化

在版面设计方面,虽然根据书坊的不同,出版质量良莠不齐,但总体来说,明版日用类书普遍较清版为佳,标题与正文间的间隔较大,整饬大方,一目了然,提示性文字还会通过添加边框的方式予以醒目展示,装饰性图片及内容辅助图片较多,美观清晰。而清版日用类书的版面则更加紧凑,大多也不会对提示性文字添加边框,致使标题与正文之间,前文与后文之间的界限不清晰,阅读体验变差。(图1)图片的使用上,清版也是能少则少。在明版中,常常在部分门类前加入一些与本门类相关的装饰性图画,但在清版中,这些装饰性图画几乎全部消失;内容辅助图片也被大量删除,如在明余文台本的“相法门”中,大小图片总计高达140余张,而在清乾隆丙寅年(1746)金闾书业堂刊刻的陈继儒系统《万宝全书》的“相法门”中,只剩下了两张图片,可见图片删减数量之大。

10) 这六个版本分别为:

①余象斗编辑:《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三台万用正宗》,双峰堂梓印,万历二十七年(1599),共43卷8册,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简称“余文台本”)

②刘双松编辑:《新板增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安正堂梓印,明万历四十年(1612),共38卷10册。(简称“刘双松本”)

③陈继儒编辑:《新刻眉公陈先生编辑诸书备采万卷搜奇全书》(封面题“万宝全书”),存仁堂陈怀轩梓印,明崇祯戊辰元年(1628),共37卷。(简称“明崇祯本”)

④陈继儒编,毛焕文增补:《增补万宝全书》,金昌书业堂梓印,乾隆丙寅年(1746),30卷6册,为陈继儒系统的30卷本代表。(简称“清乾隆本”)

以上3册均为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

⑤陈继儒编,毛焕文增补:《绘图万宝全书》,埭叶山房梓印,光绪丙戌年(1886),20卷6册,为陈继儒系统的20卷本代表。(简称“清光绪本”)

⑥陈继儒编,毛焕文增补:《增补正续万宝全书》,上海天宝书局印行,民国九年(1920),20卷续6卷6册,为陈继儒系统的20卷+续卷本代表。(简称“民国本”)

以上2册均为韩国岭南大学图书馆藏本。

11) 只统计正文页数,不包含辅助、装饰页面。

〈图1〉明清日用类书排版对比



明版的编辑也更加规范，卷首的书籍题名及门类标题，卷尾的终章标识大都比较完整，而清版的绝大部分刊本中，普遍存在门类的标题及终章标识缺失现象（图一下）。虽然这一类民间小书的编辑质量本就普遍不高，明版日用类书也常出现编辑错误，但清版的错误率明显比明版高，如在陈继儒系统清乾隆丙寅本的目录中，标十七卷为“劝谕门”，十八卷为“马牛门”，但在该书正文中，这两个门类的位置刚好相反；又如，在陈继儒系统清光绪丙戌本的目录中，十六卷名为“风鉴门”，但在正文中，这一卷被标为“相法门”，此类编辑错误在清版日用类书中十分常见。又如，明本日用类书基本严格按照门类进行内容划分，即使出现由于部分门类内容过少，不得已附在其他门类中的情况，也会在目录中予以明确提示，比如陈继儒系统明崇祯本中的“射学门”中，就附有“武学门”、“笑话门”、“琴学门”；“风月门”中又附有“闰妆门”，均在目录处以“○○门附○○卷”的形式明确著录。而清本则草率得多，并不严格遵循门类分类，实际内容与门类名多有抵触，如在陈继儒系统清乾隆丙寅本中，“农桑门”下还附有上梁文及婚礼用文字指

南,“茶经门”则插入有“名公诗句”,“酒令门”又混入了明本“风月门”中的内容,且均未在目录中单独标明,可谓混乱。

凡此种种,都表明清代书商为了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销量,不惜采用降低编辑质量的方式。虽然这使得读者阅读体验变差,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更多的家庭有能力购入,从知识的普及这一点来看,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印刷方面,清末之前日用类书的出版基本以木板雕刻为主,除印刷优劣外,各本差别不大,总体上仍然明优于清。但随着清末西方石印技术的传入,日用类书也开始进入石印时代。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石印版日用类书为1894年(光绪二十年)由上海书局出版的陈继儒系统的《增补万宝全书》,此后虽木板雕刻仍时有出现,但石印逐渐占据了日用类书印刷出版的绝对主流。

印刷方式的改变,也带动了清末日用类书编辑排版方面的变动。传统印刷中的乌丝栏消失,技术的进步也使得图片开始增加,且较前代更加精美,字体更加清晰美观。(图2)石印本日用类书的排版方式更加灵活多样,虽仍然以上下分层为主,但根据内容的需要,有时也会以单层的形式进行排版。版面也较传统印刷的类书为小,一般半郭只有12.5 x 7.5 cm左右,不过一只手掌的大小,携带方便。

印刷字体上,明版主要使用楷体字,清雕版主要使用印刷宋体字,比较呆板,石印本则又转为楷体字。

另需说明的是,以上种种变化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从图1可以看出,晚明早期(万历)日用类书最为精美,至崇祯,即明朝末年,日用类书的出版质量开始下降,但还保留着一些明版的特色,至清,日用类书的出版质量下滑程度就更加明显了。

〈图2〉石印版日用类书(陈继儒系统光绪丙午上海龙文书局本)



5) 出版者及出版地

就出版者及出版地而出版者及出版地言,明清日用类书亦有较多变化。在出版者(编者)方面,明代的出版者数量众多,大部分明版日用类书的署名编者都不相同,据统计至少在28人以上,包括徐企龙、余象斗、刘双松、冲怀(朱鼎臣)、周文焕、周文炜、艾南英、张溥、陈继儒等。这些编者有些是书坊主,如余象斗、刘双松;有些是下层文人,受雇于书坊主编写一些民间小书,如徐企龙、冲怀;还有一些则是当时的著名文人,如艾南英、张溥、陈继儒,但他们在当时社会的声望很高,想来不太可能从事这一类民间小书的编辑,因此这很有可能只是书商的营销手法,真实编者当另有其人。迨至清朝,编者的数量大幅度减少,目前可见的只有陈继儒、毛焕文、烟水山人、张溥、陈淏子五人,其中,毛焕文、烟水山人、陈淏子是清人,陈继儒、张溥是明人,而毛焕文与陈淏子2人所编之书都是在陈继儒版上进行修改而成的,由此可见,日用类书的内容至清已经基本定型,书商已经不需要再另创新本,只需在前本的基础上略加修改甚至直接复制即可,内容变动不大,编者的数量自然也就减少了。

在出版地方面,目前可考的明版日用类书中,绝大多数都系在福建出版的“闽刻本”(主要集中在建阳),只有两种在金陵一地刊刻出版。而到了清代,日用类书的出版地则呈现出分散化的发展态势,不再集中于一地,目前可考的有苏州、金陵、上海、扬州、福建建阳、北京等地,刊刻地点较明代为多。这或与明清刻书中心的变换有一定关系,就民间书坊刊刻而言,明代以福建建阳和南京为最,特别是建阳,是当时当之无愧的全国刻书中心,清人曾对此描述道:“建安麻沙之刻盛于宋,迄明末已。四部巨帙自吾乡钺板已达四方,盖十之五六”。¹²⁾无论是书坊数量,还是出版数量,建阳都远远超过南京及全国其他地区,尤其是小说杂书,仅万历至崇祯间,目前可见,出版数量就已超过千种,占全国出版总数之首位。¹³⁾由此看来,明版日用类书集中于建阳一地刊刻是与当时出版环境密切相关的。但正如前文所论,清初由于各地兵灾不断,各地书坊损毁严重,特别是建阳一地,受兵灾影响及其他各种不利因素限制,出版业一蹶不振,再难复当年盛况。如清初文人王士禛所言:“近则金陵、苏杭书坊板盛行,建本不复过岭。”¹⁴⁾福建建阳的全国刻书中心地位开始让位于江南地区,清版日用类书刊刻地点的变换正暗合了当时刻书中心变换的趋势。而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引进西式印书法的地区之一,石印术开始用于日用类书的印刷后,也逐渐成为日用类书最重要的出版中心,目前可见的晚清石印本日用类书,几

12)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p. 37。

13)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pp. 266-267。

14) [清]王士禛,《居易录》(四库全书本),卷十四。

乎全部由上海的出版机构出版。

3. 明清日用类书的内容变迁

日用类书作为书坊主为当时民间阶层编刻的生活日用“百科全书”，为契合时代需求，必然会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做出相应的改变，方才能保证销量。故抽绎明清日用类书内容变迁规律，除具备文献学价值外，更重要的是，还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民间生活发展及演变情形。同时，在内容的变与不变中，亦能看出此时期民间生活的基本样态。

1) 类目变化

明清日用类书的内容变迁首先体现在门类变化中。本文将明清至民国时期的代表性日用类书门类及对应页数统计如下（〈表3〉）。

〈表3〉 明清-民国代表性日用类书门类及对应页数统计表¹⁵⁾ (单位：页)

| 余文台本 | 刘双松本 | 明崇祯本 | 清乾隆本 | 清光绪本 | 民国本 |
|------------|-----------|-------------|-----------|-----------|-----------|
| 卷1 天文门 33 | 卷1 天文门40 | 1卷 天文门35 | 1卷 天文门36 | 1卷 天文门35 | 1卷 天文门19 |
| 卷2 地輿门 80 | 卷2 地輿门80 | 2卷 地纪门47 | 2卷 地理门47 | 2卷 地理门47 | 2卷 地理门24 |
| 卷3 时令门 16 | 卷3 人纪门72 | 3卷 人纪门38 | 3卷 人纪门38 | 3卷 人纪门38 | 3卷 人纪门22 |
| 卷4 人纪门 38 | 卷4 诸夷门68 | 4卷 文翰门22 | 4卷 诸夷门28 | 4卷 诸夷门28 | 4卷 诸夷门16 |
| 卷5 诸夷门 32 | 卷5 官品门24 | 5卷 体式门28 | 5卷 文翰门20 | 5卷 文翰门20 | 5卷 文翰门11 |
| 卷6 师儒门 37 | 卷6 律法门30 | 6卷 爵禄门30 | 6卷 农桑门14 | 6卷 清字门11 | 6卷 篆书门11 |
| 卷7 官品门 24 | 卷7 武备门18 | 7卷 诸夷门30 | 7卷 清字门11 | 7卷 字体门14 | 7卷 字学门14 |
| 卷8 律法门 50 | 卷8 8谱门34 | 8卷 律法门16 | 8卷 字体门14 | 8卷 算法门18 | 8卷 算法门18 |
| 卷9 音乐门 29 | 卷9 琴学门21 | 9卷 农桑门29 | 9卷 算法门18 | 9卷 爵禄门22 | 9卷 爵禄门20 |
| 卷10 五谱门 34 | 卷10 棋谱门34 | 10卷 时令门13 | 10卷 爵禄门22 | 10卷 时令门8 | 10卷 时令门5 |
| 卷11 书法门68 | 卷11 书法门82 | 11卷 4谱门31 | 11卷 时令门8 | 11卷 画谱门16 | 11卷 画谱门9 |
| 卷12 画谱门28 | 卷12 画谱门30 | 12卷 酒令门14 | 12卷 画谱门16 | 12卷 博弈门31 | 12卷 博弈门23 |
| 卷13 蹴鞠门40 | 卷13 文翰门22 | 13卷 射学门3.5 | 13卷 博弈门31 | 13卷 梦解门20 | 13卷 梦解门8 |
| 卷14 武备门30 | 卷14 启札门26 | 附13卷 武学门11 | 14卷 茶经门12 | 14卷 马牛门18 | 14卷 马牛门9 |
| 卷15 文翰门51 | 卷15 伉俪门14 | 附13卷 笑话门9.5 | 15卷 酒令门10 | 15卷 劝谕门10 | 15卷 劝谕门5 |

| | | | | | |
|-----------|-----------|-------------|-----------|-----------|-----------|
| 卷16 四礼门36 | 卷16 丧纪门20 | 附13卷 琴学门5 | 16卷 梦解门20 | 16卷 风鉴门22 | 16卷 风鉴门10 |
| 卷17 民用门33 | 卷17 体式门56 | 14卷 草法门13 | 17卷 劝谕门18 | 17卷 数命门32 | 17卷 数命门22 |
| 卷18 子弟门32 | 卷18 诗对门24 | 15卷 种子门14 | 18卷 马牛门10 | 18卷 笑话门 | 18卷 笑话门16 |
| 卷19 侑觞门30 | 卷19 涓吉门52 | 16卷 算法门19 | 19卷 通书门33 | 附引拳射学琴法26 | 19卷 种子门8 |
| 卷20 博戏门26 | 卷20 卜筮门86 | 17卷 画学门12 | 20卷 命理门44 | 19卷 种子门14 | 20卷 祛病门15 |
| 卷21 商旅门56 | 卷21 星命门60 | 18卷 劝谕门10 | 21卷 风鉴门22 | 20卷 祛病门26 | |
| 卷22 算法门32 | 卷22 相法门60 | 19卷 风月门21 | 22卷 数命门32 | | 续编 |
| 卷23 真修门40 | 卷23 莹宅门62 | 附19卷 闺妆门 | 23卷 笑话门 | | 共计109 |
| 卷24 金丹门28 | 卷24 修真门34 | 20卷 相法门22 | 附引拳射学琴法26 | | 卷1 |
| 卷25 养生门30 | 卷25 养生门26 | 21卷 状式门16 | 24卷 种子门14 | | 卷2 |
| 卷26 医学门40 | 卷26 医学门52 | 22卷 梦解门21 | 25卷 宅经门26 | | 卷3 |
| 卷27 护幼门46 | 卷27 全婴门34 | 23卷 玄教门26 | 26卷 堪舆门27 | | 卷4 |
| 卷28 胎产门30 | 卷28 训童门22 | 附23卷 戏术门 | 27卷 筮卜门24 | | 卷5 |
| 卷29 星命门42 | 卷29 算法门18 | 24卷 宅经门26 | 28卷 对联门14 | | 卷6 |
| 卷30 相法门48 | 卷30 农桑门36 | 25卷 医学门29 | 29卷 医学门28 | | |
| 卷31 卜筮门42 | 卷31 劝谕门20 | 26卷 养生门34 | 30卷 祛病门26 | | |
| 卷32 数课门32 | 卷32 侑觞门26 | 27卷 算命门9,有缺 | | | |
| 卷33 梦珍门38 | 卷33 笑谈门24 | 28卷 数命门32 | | | |
| 卷34 莹宅门40 | 卷34 风月门30 | 29卷 地理门27 | | | |
| 卷35 地理门32 | 卷35 玄教门20 | 30卷 通书门35 | | | |
| 卷36 尅择门34 | 卷36 卜员门42 | 31卷 卜筮门26 | | | |
| 卷37 牧养门58 | 卷37 法病门24 | 32卷 法病门31 | | | |
| 卷38 农桑门46 | 卷38 杂览门21 | 33卷 训童门32 | | | |
| 卷39 僧道门38 | | 34卷 卜筮门14 | | | |
| 卷40 玄教门26 | | 35卷 对联门20 | | | |
| 卷41 法病门40 | | 36卷 歌曲门8 | | | |
| 卷42 闲中记28 | | 37卷 杂览门21 | | | |
| 卷43 笑谑门37 | | | | | |

将上表所列的门类进行整理,去除重复门类(包括内容基本一致而名称不同的门类,门类名称以最常用之名为准),可得约50个门类,按其内容属性,这50个门类又可进一步分为传统知识门类、宗教迷信门类、实用技能门类和文学娱乐门类四个大类,具体分类如下所示(带“*”号表示该门类最终保留在20卷本中):

15) 门类名后附的阿拉伯数字表示该门页数。

| 传统知识门类 | 宗教迷信门类 | 实用技能门类 | 文学娱乐门类 |
|--|---|--|---|
| 天文门*, 地輿门*, 人纪门*, 诸夷门*, 官品门* (共计5个门类) | 相法门*, 梦珍 门*, 法病门*, 数命 门*, 真修门, 金丹门, 星命门, 卜筮门, 数 课门, 地理门, 剋择 门, 僧道门, 玄教门, 卜筮门 (共计14个门类) | 时令门*, 书法门*, 武备门, 文翰门*, 算法门*, 种子门*, 清字门*, 四礼门, 商旅门, 养生门, 医学门, 护幼门, 莖 宅门, 农桑门, 体式门, 师儒门, 劝谕门*, 律法门, 牧养门* (共计19个门类, 另有续卷本 4卷) | 五谱门*, 琴学门, 画 谱门*, 笑谑门*, 蹴鞠门, 风 月门, 侑觞门, 博戏 门, 诗对门, 射学门, 歌曲门, 茶经门 (共计12个门类, 另有 续卷本2卷) |

现依次对四个大类的变化情况予以论述。首先是传统知识门类, 该大类下门类最少, 但也最稳定, 明清各个版本的日用类书均包含这5个门类, 除内容多少外, 基本无变化, 且排序都比较靠前, 尤其是天文门, 地輿门, 人纪门三门, 几乎所有日用类书均将其放在书首, 这显示出日用类书对于传统类书的继承, 即所承谓“天、地、人、事、物”的排序方式, 也代表了中国传统民间社会对于儒家世界观的坚守。

其次是宗教迷信门类, 主要是一些扶乩、画符、择日、算命、看相之术, 都是一些具体技能, 少有理论说教, 反映出民间对宗教迷信的接受特点——以实用性、功利性为主。虽然宗教迷信门类随着明清日用类书门类整体减少的趋势, 由最高峰明初的12个, 减少到清末的4个, 但其占比一直比较很稳定, 在各版本中的内容占比都相对较高, 大致保持在20%-30%之间(见下表), 直到清末, 由于石印版新增续卷均无宗教迷信门类, 其占比才陡然下降到15%左右。由此可以看出, 不论时代如何发展, 即使在清末民初, 西方科学技术思潮已经开始逐步在中国传播, 但在最广大的民间社会, 仍然对于宗教迷信有着不低的需求, 反映出此时期民间信仰的普遍性。

| 项目 | 余文台本 | 刘双松本 | 明崇祯本 | 清乾隆本 | 清光绪本 | 民国本 |
|--------|--------|--------|--------|--------|--------|--------|
| 门类数 | 12 | 9 | 10 | 8 | 4 | 4 |
| 页数 | 438 | 441 | 243 | 228 | 100 | 55 |
| 占总门类数比 | 27.90% | 23.68% | 27.02% | 26.67% | 20.00% | 15.38% |
| 占总页数比 | 26.87% | 30.54% | 27.61% | 33.09% | 21.93% | 13.96% |

再次是实用技能门类, 这一门类主要是一些生活常用技能, 种数最多, 而又变化最大, 各版本多有不同, 随着日用类书整体缩水的趋势, 该大类的门类数量下降幅度相对不大, 但页数下降幅度却很惊人, 接近84%(见下表), 可见该大类的的内容删减之多。

| 项目 | 余文台本 | 刘双松本 | 明崇祯本 | 清乾隆本 | 清光绪本 | 民国本 |
|--------|--------|--------|--------|--------|--------|--------|
| 门类数 | 17 | 15 | 15 | 11 | 8 | 12 |
| 页数 | 699 | 476 | 312 | 181 | 113 | 153 |
| 占总门类数比 | 39.53% | 39.47% | 40.54% | 36.67% | 40.00% | 46.15% |
| 占总页数比 | 42.88% | 32.96% | 35.45% | 26.27% | 24.78% | 38.83% |

该大类的许多门类在日用类书发展后期（清乾隆后），被书商删除，如师儒门、律法门、四礼门、商旅门、体式门、农桑门等。这些被删除的门类中，有些是因为应用度不高，如“农桑门”，该门类除在余文台本中有能真正指导农业生产的有关内容外，在其他各本中，“农桑门”的下层不过是一些反映耕作场面的图片及对应的诗词而已，显然这是编者为城市居民领略田园生活风貌准备的。而它本“农桑门”的上层内容虽有一些种植技巧，但过于简略，且多观赏性植物的养育方法，与其说这是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不如说是为了满足非农业工作者的好奇心理而做的一般性介绍。也因此，在清朝后期的20卷本中，“农桑门”作为一个不太实用的门类，自然会被淘汰。而有些门类则是因为相应专书的大量出现而被删除的，如“师儒门”（训童门），该门主要是一些童蒙教育内容，在明本中多见，而清本皆无，这或是由于清代童蒙教材较明代发展更盛¹⁶⁾，购买童蒙专书的效果更好，故在日用类书中再加入童蒙教育内容就不再适宜了。有学者认为此种现象反映出清代日用民间知识更加专门化的倾向¹⁷⁾，但考虑到专科性日用类书自明至清不断刊刻，而综合性日用类书却不断简化的事实，这一问题恐并非“民间知识专门化”所能解释概括的，仍需学界进一步研究。

另需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对民间出版的严格限制似乎也对日用类书的门类设置产生了影响。例如，明代的日用类书中一般都包含有对法律知识进行普及的“律法门”，以及诉讼文书写作指导门类（一般称为“体式门”），而清本皆无。传统上，法律出版一直为官府控制，在明末以前，政府对民间出版法律书籍有诸多限制，明嘉靖、万历后，许多民间书坊才开始大量印刷法律书籍¹⁸⁾，加之晚明民间的“好讼”风气所带来的实际需求，故此时期产生的新型日用类书也相应地加入了律法内容。但明清易代之后，清廷对于明朝律例多有改变，且对律法相关出版物的管制也相对加强，如顺治律规定：“条例申明颁布之后，一切旧刻事例，未经今次载入……悉行停寝。”¹⁹⁾尽管这条规定因袭前朝旧律，但

16) 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沿革〉，《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pp. 43-44。
17) 王振中，〈清代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为例〉，《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p. 51。
18) 张婷，〈法典、幕友与书商——论清代江南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pp. 48-59。
19) [清]刚林等《大清律集解附例》卷三十，1670年刊本。

在清代司法实践中却被严格执行，²⁰⁾又如乾隆七年，刑部议覆四川按察使李如兰条奏定例中就明确规定：“坊肆所刊讼师秘本如《惊天雷相角》、《法家新书》、《刑台秦镜》等一切构讼之书，尽行查禁销毁，不许售卖。有仍行撰造刻印者，照淫词小说例，杖一百，流三千里……藏匿旧板不营销毁，减印刻一等治罪。藏匿其书，照违制律治罪……”²¹⁾可见清廷对于法律出版物管理之严格。而日用类书既为民间杂书，扩大销量盈利是出版商之主要目的，担负法律风险加入律法相关内容显然不是明智之举，由此，删除律法内容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由明入清，日用类书也有新增门类——“清字门”。该门类主要是将一些生活常用词语分门别类，以满汉文对照的形式刊载，方便使用者查找使用。“国语”（即清语、满语）与“骑射”（即骑马射箭）作为满洲的两大民族特征，自皇太极起，即被正式确立下来，并作为满清的一项基本文化政策所奉行和坚持。²²⁾历朝皇帝均施行过推崇满文的相关政策，如奏折“兼用满汉文字”，牌匾及石刻碑文、钱币等均须满汉文合用等。日用类书中出现满文相关内容，说明在当时，即使是民间阶层，亦需知晓常用的满文，以应日常所需。

最后是文学娱乐门类。该大类主要是一些娱乐活动及文学作品，前者包括音乐、棋牌、蹴鞠、风月等，后者基本是一些文字游戏，如趣味诗对、酒令、笑话等，旨在供读者消遣。该大类的占比一直较低，在清末20卷本中，更是只剩下3个门类。显示出民间对于日用类书实用性及娱乐性的不同处理倾向，亦可从文学门类的删除保留中看出民间对于文学的接受特点及阅读喜好。

| 项目 | 余文台本 | 刘双松本 | 明崇祯本 | 清乾隆本 | 清光绪本 | 民国本 |
|--------|--------|--------|--------|--------|--------|--------|
| 门类数 | 8 | 9 | 9 | 6 | 3 | 5 |
| 页数 | 256 | 244 | 140 | 109 | 73 | 85 |
| 占总门类数比 | 18.60% | 23.68% | 24.32% | 20.00% | 15.00% | 19.23% |
| 占总页数比 | 15.71% | 16.90% | 15.91% | 15.82% | 16.01% | 21.57% |

文学娱乐门类中的“风月门”的发展历程较为特殊，在此特别说明。该门类主要辑录的是一些性药药方、房事实用技巧、嫖场及情场经验等与男女相关的内容，在明代日用类书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几乎所有版本的日用类书都设有该门类，且篇幅占比较大。但迨至清代，该门类在日用类书中却突然消失，仅在30卷本中保留了一些性药药方，并将具有色情性质的内容全部删除，合并入“酒令门”中，不再单独设立门类。至20卷本中，风月

20) 张婷，前揭，pp. 48-59。

21) [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40（刑律之十六，诉讼之二），光绪三十一年京师刊本。

22) 刘彦臣，〈清代“国语骑射”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p. 38。

门相关内容已被全部删除。

此外，日用类书在发展过程中还常出现多个相似门类合并的现象，如余文台本中的“胎产门”与“护幼门”中的相关内容，在刘双松本中就被整合为“全婴门”。在清本中，甚至一些本不相关的内容也被整合为一个门类，如“笑话门”中，还附有射击、拳棒及古琴相关内容。

2) 具体内容的变化

以上是对明清日用类书类目变化的论述。下面对书中具体内容的变化做进一步探讨。由明入清，及至民国初年，日用类书的内容有三次比较大的变化。

第一次变化出现在清前期（乾隆年间）。在明清交际的大背景下，日用类书为顺应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做出相应改变，这些修改主要是为了符合清朝的统治政策及朝代交替的新情况，大多出现在对朝代更替比较敏感的“地理门”、“人纪门”中。如在清30卷本的“地理门”中，相对于明版日用类书，就使用了一些清朝特有的地名，包括“盛京”、“江宁府”（即明之“应天府”）等。同时，清本中还增加了许多朝代更替后应予说明的内容，如“地輿纪”末，就新增有“明归于大清皇帝”字样，并将“大明一统山河地輿纪图”中的“大明”改为“大清”。在“人纪门”，这样的改变也很常见的，“历朝君纪”中就新增有“大清纪”，朝代歌诀中亦增有“大明江山归大清，顺治开来日月秋”句。不仅如此，清本日用类书对于朝代更替所带来的一些细节变化也十分注重，如在“笑话门·附引拳射学琴法”中的“要家临危解法”图示中，图中人物均为清式辫子打扮，而明本中则为传统汉族服饰（见<图3>）。

〈图3〉明清“要家临危解法”图示对比



但应该看到，凡此种种，均为传统王朝交替下不得已的正常变化，日用类书的内容并未发生质的改变，仍为传统封建社会下的民间生活指南，除详略外较明本并无本质区别。

第二次变化出现在清末（光绪年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门户，成为列强通商之地，西方商品及文化制度开始流入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巨大改变，这不能不反映到日用类书的修订中来，此时期出现的陈继儒系统续5、6卷本日用类书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目前已知晚清共有4种续卷本，均在上海出版，最早的续卷本为1894年上海书局出版的续5卷石印本，在1906年又出现了龙文书局出版的续6卷本。这些续卷本内容基本一致，新增内容主要是一些新形势下的商务知识，并配有一些养生娱乐知识及实用技巧。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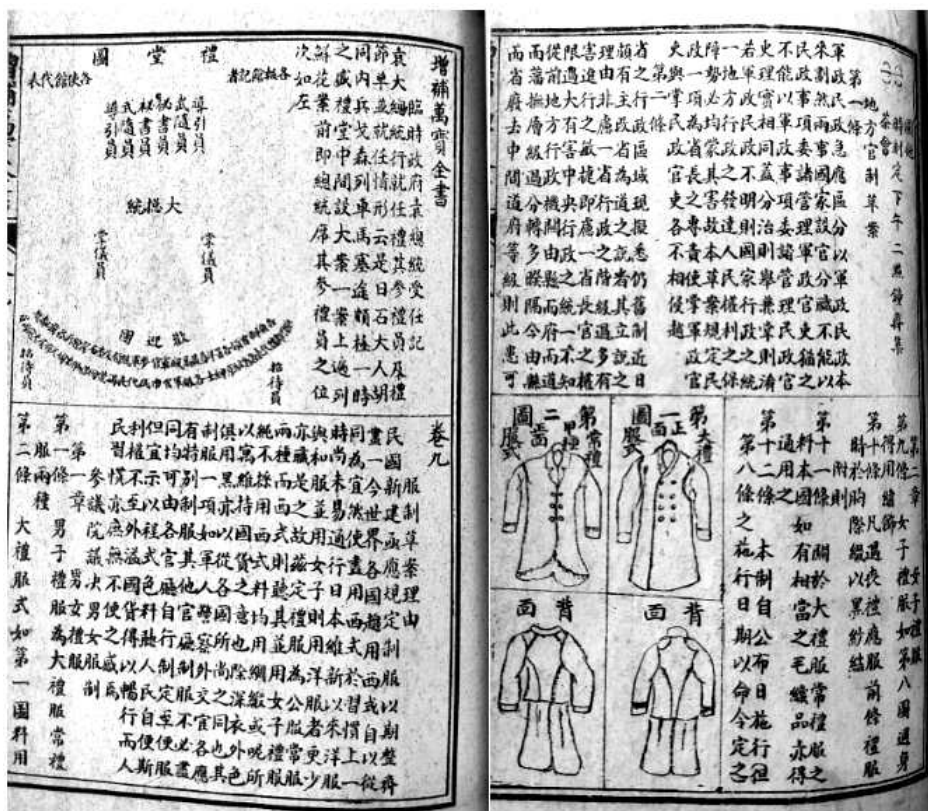
| 续编卷一 | 卷二 | 卷三 | 卷四 | 卷五 | 卷六 (5卷本无) |
|---------------------------------|------------------------------|------------------------|----------------|--------|----------------------------|
| 上 | 上 | 上 | 上 | 上 | 上 |
| 看银洋要诀 天师印图 镶铜铅洋图 真伪洋边办 | 通商章程善条 约 行船防备碰撞 条款 | 贸易须知要言 生意学徒说 | 养禽鸟法 鱼鳖说 | 各样戏法奇图 | 李淳风六壬课 泰西养生要法 |
| 下 | 下 | 下 | 下 | 下 | 下 |
| 银面花纹名目 论真伪银总略 | 长江通商章程 条约 中外各国轮船 旗式 | 申江纪略并洋 务事 申江诸色杂论 | 花木性情辨 居家装潢说 | 各样戏法图说 | 林文正公戒烟 总论·奇方附 各种急救良方 |

这些新增内容大部分是为了应对在清廷被迫开放门户，与西方列国通商后出现的新情况，这些新知识不仅为前期日用类书所无，在整个传统知识体系中也难以找到对应位置。这标志着此时期的续卷本日用类书已经不再只是传统社会的生活指南，其部分内容的性质已经发生改变，是清末民间社会近代化历程中的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缩影。

第三次变化出现在民国建立后。民国的建立，推翻了满清及封建政权的统治，政治、社会制度为之一变，日用类书亦对此时期出现的种种变化予以了一定反映。同清初日用类书第一次大变类似，此次修订也主要是以反映政权更替为主，如清本日用类书必备的“清字门”，被改为了“篆书门”，就是推翻满清政府后的应有之义。但由于民国政府毕竟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代共和政府，民国时期日用类书为此也做出了相当大的改变，这主要体现在“爵禄门”的修订中。传统的“爵禄门”主要辑录的一些有关官员品级、服

色、礼仪、月俸的内容,明显已不再适用于民国,于是日用类书的编者索性将“爵禄门”全部重新编写,替换为民国的政治制度及社交文化,包括“临时政府袁总统受任记、地方官制草案、军士服制令、民国服制草案、民国礼制、文明帖式、各学校章程规例文、文明结婚礼式图、民国公文格式”等,还补有各类对联、时书文(即新式书信范例)等,内容丰富,远远超出“爵禄门”原有的范畴。续卷内容基本与清本相同,只有少量顺应时代的修改,如在续卷二的“中外各国轮船旗式”中,新增有民国旗式。

〈图4〉民国本“爵禄门”



清末续卷本日用类书与民国日用类书都存在新旧杂陈的特点。书中正文大部分内容直接继承前期类书,只在必要处有少量增删,而续卷大部分内容及民国版的“爵禄门”又具有十分明显的近代化特征,是传统知识体系中所没有的内容。传统与现代杂糅在日用类书中,是当时民间社会近代化过程中的真实写照。

4. 结语

日用类书刊刻热潮持续两三百之久，但由于其通俗平常的特点，往往被视为不具流传价值，因而读者在使用后即予毁弃，以致不见于一般藏书家的收藏，亦未收于《四库全书》等官方书目中，常为广大学者所忽略。如今此类书籍散落海内外各地，搜求尤为不便，故学界至今缺乏对其源流变迁全貌进行考察的研究成果，对研究者使用该类文献造成了一定困难。

本文简要梳理了自晚明至民国初年综合性日用类书的发展历程及版本、内容变化，以求方便学人。可以看到，自晚明后，新型日用类书由最初的百花齐放，逐渐统一定型，目前可见，至清朝，唯陈继儒系统的日用类书仍在不断重新刊行，其他系统的日用类书已经较少看到。书名由繁变简，至清统一为“万宝全书”。为控制成本，增加销量，内容量呈逐渐减少态势，由明早期的43个门类下降到晚清最低时的20个门类，页数更是由明早期的1630页下降到456页（木版本），编辑排印质量也逐渐降低，至晚清由于西洋石印技术的广泛推广，此一现象才被扭转。

内容上，日用类书还一直根据时代的变迁及需求的变化而不断改变书中具体内容，并在清乾隆、光绪年间及民国初年（民国初年后的情况本文不做讨论）进行了三次较大的内容修订，但这种改变与现实相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不过，在共时层面上，特定时间段内，同一系统，乃至不同系统间的内容仍高度相似。可以看出，明清日用类书整体向简化与制式化演变。

【参考文献】

〈专著〉

[清]刚林等《大清律集解附例》卷三十，1670年刊本。

[明]归庄，《归庄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清]梁章钜，《归田琐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索尔讷，《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清]王士禛，《居易录》（四库全书本）。

吴惠芳，《万宝全书：明清时期的民间生活实录》，新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

吴惠芳，《明清以来民间生活知识的建构与传递》，台湾学生书局，2007。

[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40（刑律之十六，诉讼之二），光绪三十一年京师刊本。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论文〉

崔桓，〈中国近现代类书的 종합적 연구〉，《东亚人文学》，第49辑，2019。

苏航、崔桓，〈日用类书《万宝全书》的版本源流和系统研究〉，《东亚人文学》，第47辑，2019。

刘彦臣，〈清代“国语骑射”政策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0。

刘艳卉，〈我国古代蒙学识字教材的历史沿革〉，《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王振中，〈清代前期徽州民间的日常生活——以婺源日用类书《目录十六条》为例〉，《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张婷，〈法典、幕友与书商——论清代江南法律书籍的出版与流通〉，《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논문초록】

| | | | | | | |
|--|-------|---|-------|-------------|-------|-------------|
| 키워드 Key Words | 중문 | 明清综合性日用类书, 日用类书, 万宝全书, 版本发展, 内容变迁 | | | | |
| | 영문 | Life encyclopaedia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Life encyclopaedia, Wanbao Quanshu, Edition changes, Content changes | | | | |
| <div><div>A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Comprehensive Life Encyclopaedia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div><div>Su, Hang • Choi, Hwan</div><div><p>The new type of comprehensive Life Encyclopaedia that appeared in the Ming Wanli years were close to the folks and life, and the enthusiastic publishing lasted for two to three hundred years and preserved the first-hand information on social life at that time. owadays, such books are scattered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t is particularly inconvenient to search for them. Therefore, the academic circle lacks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overall investigation of their origin and evolution, which causes some difficulties for researchers to use such literature.By systematically combing the editions of Life Encyclopaedi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ent changes of Life Encyclopaedia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and reveals that after the late Ming Dynasty, Life Encyclopaedia gradually form a unified form from the initial diversified editions.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cost and increase the sales volume, the volume of such books is decreasing gradually.In terms of content, the Life Encyclopaedia use has been constantly changing its specific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times and needs, and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Emperor Guangxu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content of the book was revised three times.</p></div></div> | | | | | | |
| 저 자 | 제1저자 | 소항 / 苏航 / Su, Hang | | | | |
| | 교신저자 | 최환 / 崔桓 / Choi, Hwan | | | | |
| 논문작성일 | 투 고 일 | 2021.08.18. | 심 사 일 | 2021.08.26. | 게재확정일 | 2021.09.16. |